

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

叶华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通过分析 2013 年的第 2 期“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数据, 本研究发现, 有不同经历、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香港居民, 在身份认同上也有差异。对不同的群体进行比较后, 研究发现香港居民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没有什么差异, 但相对而言, 在香港出生的本地居民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比在内地出生的香港居民强。在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上, 在香港出生的本地居民相对较弱, 年龄在 15-34 岁的年轻人相对较弱, 教育水平为大专/非学位专上教育的香港居民也相对较弱。

关键词: 中国人; 香港人; 双重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一、最优区分理论与香港居民的双重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指的是人们在心理上与某个群体相接近, 对某个群体有归属感。最优区分理论(Optimal Distinctiveness Theory)认为, 身份认同的动力来源于人类的两种需要, 其一是融合与被接纳的需要, 指的是人们在心理上对特定群体的依归, 其二是与他人相区分的需要(Brewer 1991)。满足了这两个需要后, 人们既获得了归属感, 又保证不会在群体中迷失自我。

种族和民族身份是影响人们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 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在多元民族国家中, 人们的民族身份差异并不一定影响对国家的认同。此外, 来源于同一个民族的人们也可能认同不同的国家。十八世纪后期从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上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 就是上述两点的恰当例子。美国的诞生说明了另一点, 即地理隔阂的存在, 或者在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导致的交流机会的匮乏, 都可能影响身份认同的形成, 而共同的生活和历史经历, 则能促成认同的形成。

正如人们可能参与不同的社会组织, 因此有不同的成员身份, 同一个人也可能有不同的身份认同。从大的方面说, 我国的各个少数民族不仅认同自身的民族, 也认同中华民族。从小的方面说, 居住在不同地区的汉族居民有不同的方言, 仅在广东, 根据方言和生活习惯, 我们就有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 他们各自都认同于自身的身份, 也认同于广东人和中国人的身份。

最优区分理论指出, 人们对归属感和与他人相区分的需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当人们与心理认同的群体由于客观原因而有联系沟通上的困难时, 身份认同中的归属感需求会更强烈(Brewer 1999)。欧亚混血作家韩素音曾说, 在殖民地时期, “繁荣但缺乏确定性, 在一处借来的地方, 在借来的时间里表现得精力充沛, 那就是香港”。从“借来”一词就可以看出, 那时在香港居住和工作的香港居民, 并没有“香港人”的概念, 在英国殖民政府的管辖下, 他们只把香港看做“借来的地方”, 而他们的心理归属仍是中

大陆。香港早期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都提到早年许多香港人把当时的广州称为“省城”,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

有学者指出,“香港人”这一身份出现的契机,实际上是中英就香港的前途谈判,并且香港在1997年回归祖国已成定局的时候(Brewer 1999)。在那一刻,香港居民的“中国人”的归属感得到了满足,相应地,与内地其他地方相区分的需求则变得相对更重要。这种区分与我国不同民族、不同方言地区居民对自身特殊性的强调并无二致,也与我国内地居民初次见面时提及籍贯的习惯也没有多少区别,香港居民所面对的,是如何在中国的辽阔国土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回归前,虽然香港居民中30%以上来自我国内地,且绝大部分来自广东地区,但由于香港由英国统治,边境管制虽然割裂不了两地居民的联系,但毕竟影响了两地居民交流。此外,香港与内地分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两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也有差异,制度上也有差异,因此香港与内地居民在观念上难免有不同。许多研究也表明,为了同时满足归属感和区分的需求,许多地区的人们形成了双重的身份认同(Brewer 1999)。这双重身份认同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种共存的状态,两种身份认同强度的变化受到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也受到不同群体经历和感受的影响(Kim and Ng 2008)。其中“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凝聚了香港居民,众志成城,推动了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则让香港居民时刻关心内地的变化和发展,并在内地遇到困难,例如水灾或者地震时,慷慨捐助。因此,对香港居民的双重身份认同也值得分析。

二、研究方法 with 实证研究结果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¹。该调查由香港科技大学吴晓刚教授主持,是一项大型家庭追踪调查,采取电脑辅助访问的方式进行入户调查(吴晓刚,2014),分别在2011年、2013年和2015年完成了三期调查。在2011年进行的第1期调查中,项目组使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了有全港代表性的住址,目标是访问3500户家庭,实际访问了3214户家庭。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第2期调查,该次调查成功追访了2165户家庭,以及家庭中的4270位15岁及以上的成人和623位15岁以下的儿童(由孩子的父母或主要照顾人代答)。在2013年进行的调查中,我们对15岁及以上的成人询问了他们对“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其中1表示“非常不认同”,4表示“一般”,7表示“非常认同”。以下的分析通过计算身份认同的平均值来反映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

我们先从人口学因素看不同群体的香港居民对“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差异。图1展示的是女性和男性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从图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在1-7分的身份认同中,对“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都很高,其中“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稍高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但差距不大。这种差距是可以理解的,香港居民日常生活首先面对的是香港本地的环境,因此在看待问题上自然从香港出发。此外,统计分析发现,无论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还是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男女之间都没有显著差异。

¹ “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的详细介绍见:<http://caser.ust.h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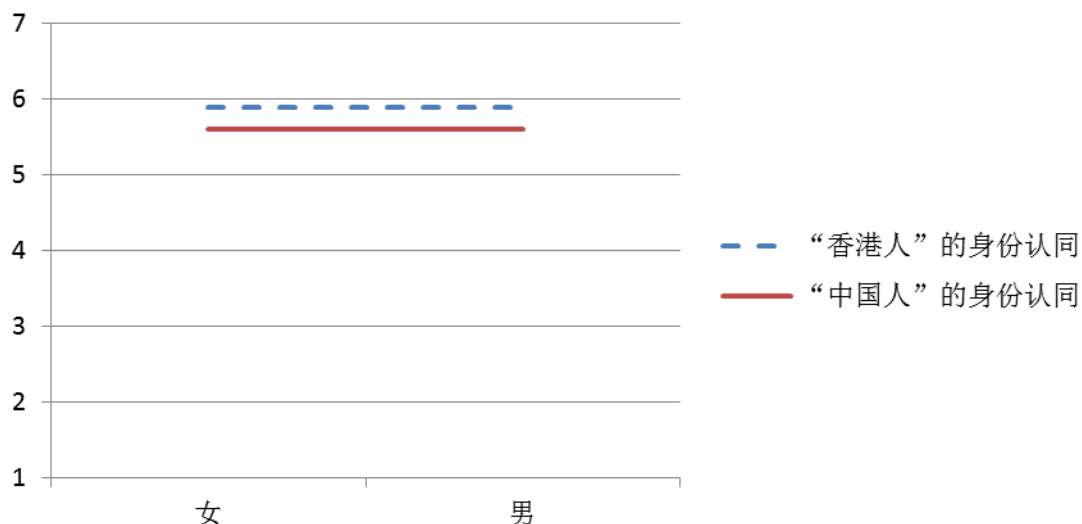


图 1：香港的男性和女性居民的身份认同

由于生活经历的差异和成长环境的变化，不同年龄组的香港居民在身份认同可能有差异。图 2 显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发现：总的来说，年龄越大的香港居民，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越强。香港现居民中，30%左右出生于内地（叶华，2015），尤其是年长者，因此他们在情感上对“中国人”归属感很强。年龄 35 岁以上的香港居民在“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上没有什么差异，身份认同的均值都在 6 左右。而对 15-34 岁的香港年轻人来说，他们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高于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其中对“香港人”和“中国人”身份认同差异最大的是最年轻的 15-24 岁的香港居民。

首先需要指出，15-24 岁的香港居民仍然是认同“中国人”身份的，因为他们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均值大于表示“一般”的 4。这一代香港年轻人，是 1997 年香港回归之前出生的最年轻的一代香港人。他们对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并没有多少认识，因此也对港英殖民政府对待华人的策略和变化没有多少了解。香港回归后，内地和香港的联系更紧密，“自由行”政策出台后内地旅客增多，内地申请赴港的移民也增多，在这种环境下，内地旅客和新移民与香港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矛盾难免。在香港进行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内地旅客确实对香港的公共交通造成压力，也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内地居民中，经常到香港购物的人比例并不高，但由于内地居民基数大，即使比例很低，总量也很大，会对香港的公共交通造成压力。由于香港居民通勤主要靠公共交通，旅客的增多对他们的出行有影响。此外，随着内地旅客增多，香港的消费市场也受到冲击。出售内地旅客青睐的化妆品、金饰、手表和奢侈品的商铺得到发展，部分商铺的产权所有者提高租金，经营者压力增大，结果是迫使方便香港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小店铺搬迁到租金更低、但更不便利的地方。这些都对香港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 15-24 岁的年轻人并不了解殖民历史，难以进行客观的比较，在与他们面对的内地冲击对比后，在头脑中美化了殖民时期香港的状况，误以为香港可以靠自身来发展。

其次，在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上，不同年龄段的香港居民没有明显差异。即使是相对而言对“中国人”身份认同最低的 15-24 岁年轻人，他们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也只

是稍高于 25-44 岁年龄组，并没有高于 45 岁以上的年龄组。换言之，15-24 岁的香港年轻人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与其他年龄组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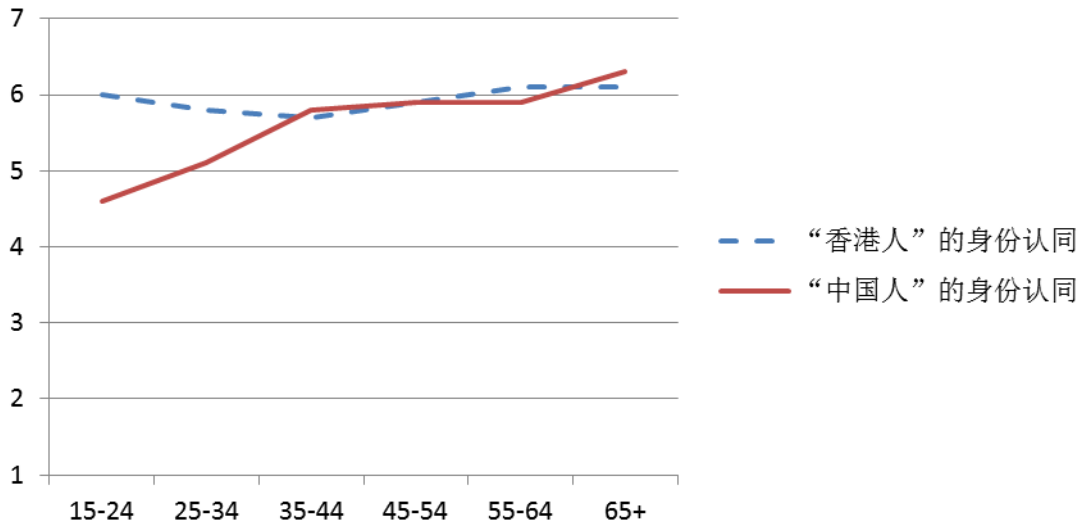


图 2：不同年龄组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

如果区分香港居民的出生地，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出不同群体的差异（图 3）。出生地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很明显：香港本地出生的居民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高于出生于内地的香港居民，而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则低于出生于内地的香港居民。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是这两个群体的成长经历有差别，亲属网络也有差别，因此与内地的联系紧密程度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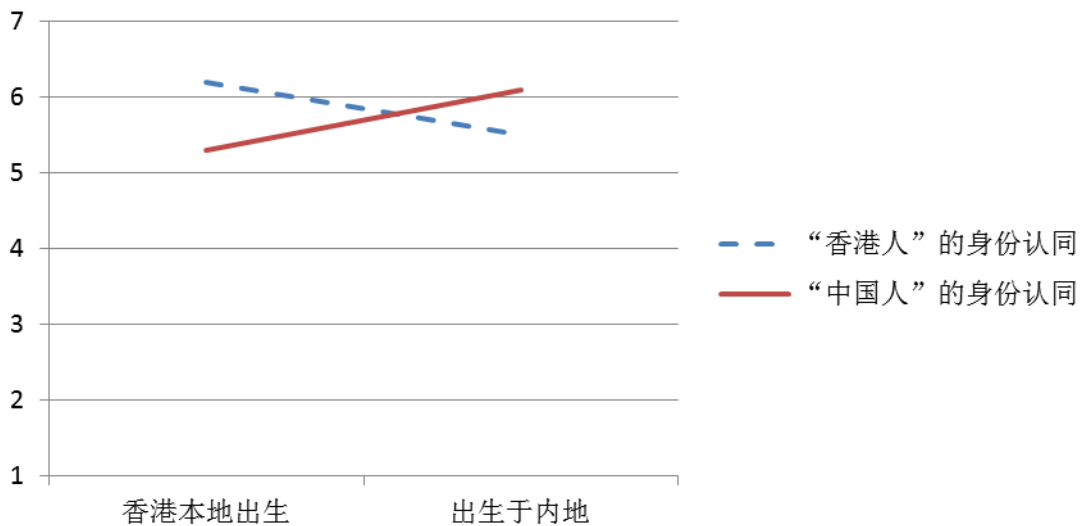


图 3：出生地与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

图4展示的是在不同地区的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居住在不同地区的香港居民，在“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上没有什么差异，但对“中国人”身份认同有差别。居住在九龙的香港居民对“中国人”身份认同最高，而居住在香港岛和新界的居民对“中国人”身份认同较低。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是居住在香港岛的香港人经济地位相对更高，从事的更有可能是金融等与全球化关系更紧密的工作，并且他们也更可能感受到内地旅客购物对他们日常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新界居民则更可能受到新移民和“水货客”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稍低。需要指出的是，居住在三个地区的居民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都较高，上述都只是相对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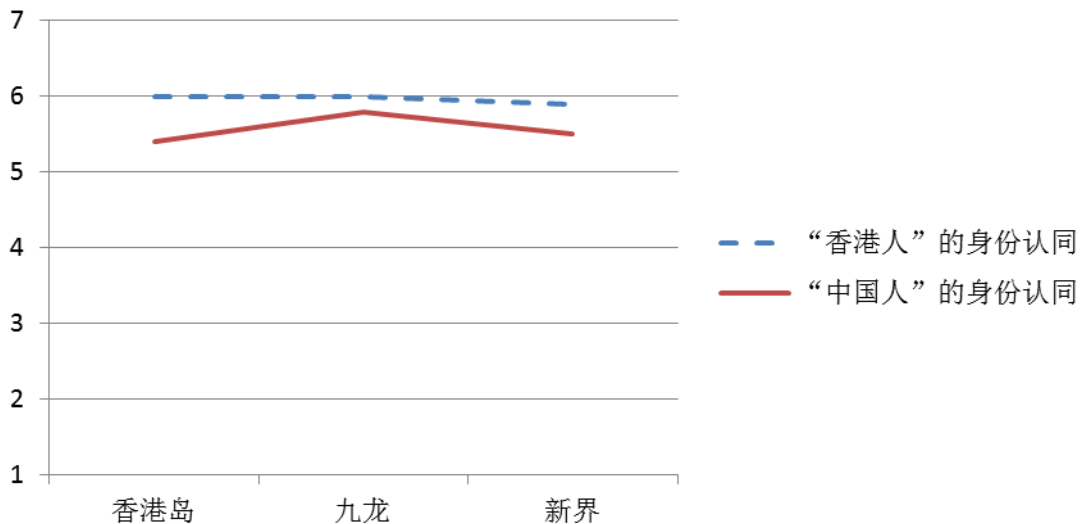


图4：居住区域与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

教育水平也可能对人们的身份认同造成影响。从图5可以看到，在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上，不同教育水平的香港人没有什么差别。有差别的是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大专/非学位专上教育水平的香港居民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相对较低。香港高等教育经历了大规模扩招，现阶段大专/非学位专上教育水平的香港居民主要是年轻人(与图2相对应)，他们的学历处在一个较尴尬的位置上，面对的经济压力较大。他们可能要与到香港求学的内地学生竞争，而经济机会上的竞争可能形成了态度上的排斥，在身份认同上对区分的需求更强烈，因此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相对较低。而大学或以上教育水平的香港居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位置相对较好，面对的竞争相对较小，因此相对而言比大专/非学位专上教育水平的香港居民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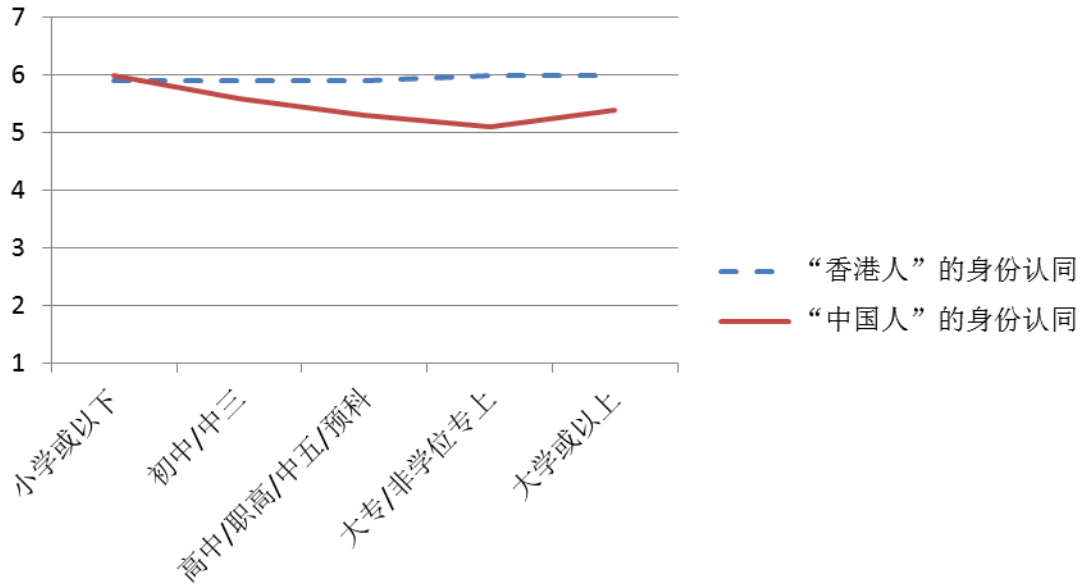


图 5：教育水平与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

图 6 展示的是不同就业状态的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从分析结果看，不同就业状态的香港居民在身份认同上没有什么区别，就业状态并不是影响香港居民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香港的失业率自 1995 年至今都很低，即使是受 SARS 影响的 2003 年，失业率也没达到过 9%²。所以，香港居民担心的并不是失业，而是即使就业，但在香港较高的消费水平环境下仍入不敷出。因此，在对“中国人”和“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上，不同就业状态的香港居民没什么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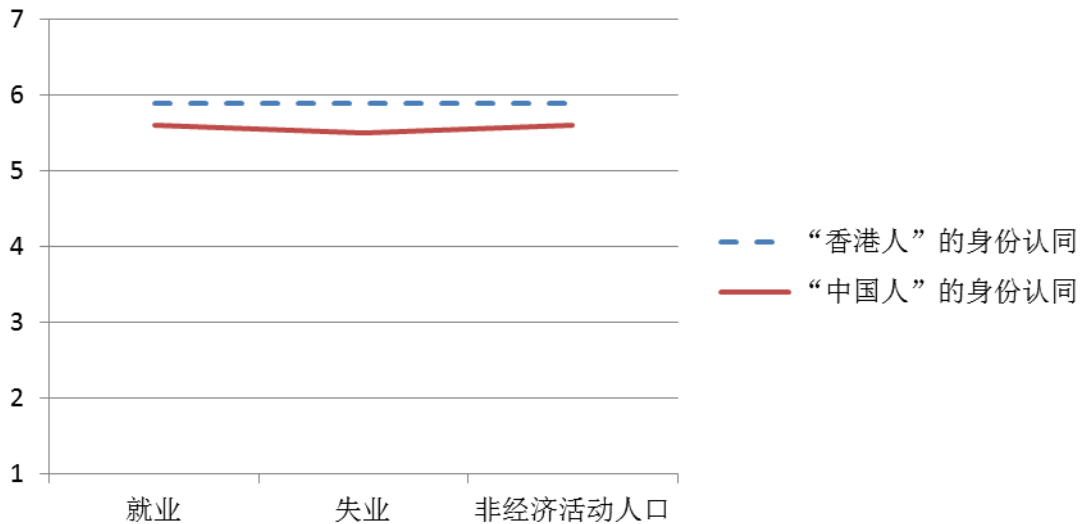


图 6：就业状态与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

²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http://www.censtatd.gov.hk>

三、结论与讨论

社会学和人口学的研究都强调对异质性的探索：正是人与人之间不同，我们才要进行比较和分析。如果所有人都一样，我们闻一知十，也就不必进行调查研究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将“香港居民”看做一个单一的群体，是一种过于简单的理解。香港居民具有双重身份认同，包括对地域的认同（即“香港人”）和对民族的认同（即“中国人”）。用性别、年龄组、出生地、居住地区、教育水平、就业状态来区分后，本研究发现有不同经历、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香港居民，在身份认同上也有差异。对不同的群体进行比较后，本研究发现香港居民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没有什么差异，但相对而言，在香港出生的本地居民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比在内地出生的香港居民强。在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上，在香港出生的本地居民相对较弱，年龄在15-34岁的年轻人相对较弱，教育水平为大专/非学位专上教育的香港居民也相对较弱。

需要指出的是，香港15-34岁的年轻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较低，最重要的问题恐怕不是“去殖民化”没有完成，而是他们不了解殖民历史，所以在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误以为自己没有经历过的历史更美好。因此，对港英殖民时期的香港历史要做更多研究，让年轻人更了解这段历史。上述判断的理由有四：首先，如果“殖民化”对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有影响，那么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居住在港英殖民政府统治之下的时间更长的居民，也即年长的居民。但从图2我们可以看到，在1-7的认同度测量中，35-64岁的香港居民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接近6，而65岁及以上的香港居民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最高，认同度超过6。如果“殖民化”影响了香港居民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那么应该看不到这样的结果。既然“殖民化”的影响没有预想的大，那么纯粹的“去殖民化”能有多大影响则存疑。第二，如果15-24岁的香港居民对“中国人”身份认同低是因为“去殖民化”没有完成，那么我们应该同时看到这个群体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也即香港人在双重身份认同中越来越倾向于“香港人”这一方，但在图2中我们也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实际上在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上，不同年龄段的香港居民差别不大，认同度都在6左右。第三，即使是对“中国人”身份认同最低的15-24岁的香港居民，其认同度也在4以上，也即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媒体报道的香港年轻人的极端行为只是一小群人的行为，虽然有不同的声音，但这些行为并没有民意基础。最后，从图5可以看到，对“中国人”身份认同最低的，是教育水平为大专/非学位专上教育的香港居民，其认同度在5左右，大学或以上教育水平的香港居民认同度次低，在5.5左右。由于香港从2002年开始高等教育扩招，获得高等教育的人口增长幅度很大，所以这两个群体是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面对激烈的竞争。对“中国人”身份认同最低的15-24岁的香港居民在成长的过程中，既看到的香港回归后内地和香港更紧密的经贸联系和内地游客的增多，又遇到了高等教育扩招后就业上的困难，因此很容易将两者联系起来，将自己就业的困难归罪于内地与香港的联系，而忽视了香港经济结构本身存在的问题。这个群体所接受的教育中，对殖民地历史的客观介绍并不多，因此对殖民地历史并没有批判的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认为“去殖民化”未能完成，影响了香港居民的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更合理的解释是香港年轻人对殖民地时期的香港社会了解不深，使得他们不能客观地比较和评价。

加强内地和香港的互相理解和社会融合，其宗旨应该是“渐进”。任何两个地区的人都可能由于经历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观念，而身份认同既包含“求同”，也有“存异”。香港居民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群体，他们对与内地融合接受程度不同，而且实际的融合过程也对他们的影响不同，并不是所有香港人都认识到这种融合的长远好处，加上香港有相当长一段与内地相对分割的历史，因此内地相关政策的制定需要有长远眼光和延续性，不应期望任何政策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至今,遇到了不少问题,例如贫富悬殊、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少,高等教育扩招后非学位专上教育年轻人的经济机会少,居住环境不尽人意等。举例来说,大专/非学位专上教育水平的香港居民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相对较低,与他们的经济机会少不无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内地和香港社会经济往来出现的问题,被作为部分香港居民对现实不满的“替罪羊”。解决上述问题或者改善上述群体的境况,对增进内地和香港社会融合有正面影响。

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居住了超过700万人口。相比较而言,内地是一个“庞然大物”,每个城市只需要很小比例的人口赴港旅游,其总量也非常大,会对香港本地的公共交通造成巨大压力,并大幅度改变香港消费品市场的结构和发展。香港现有店铺如果倾向于服务内地旅客的需求,则很可能顾此失彼,对香港居民日常生活的便利性产生巨大影响,例如是否能够方便地购买到生活用品,公共交通出行是否便利等。因此在加强粤港澳社会融合的时候,需要考虑内地的人口基数对香港的影响,对发放自由行签注在总量上有一定的规划,在支持香港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兼顾香港居民的日常生活。

内地和港澳居民天然的亲属关系和文化联系是推动社会融合的重要力量。同为中华民族,拥有相同的文化基因,民间的联系是内地和香港社会融合最重要的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对香港发生的事件进行报道时,负面报道的增多,对两地居民在感情上都有上海。强调香港旅游业的“衰落”、报道部分年轻人激进和不理智的行动,不利于内地和香港居民对相同文化价值的认同:这些报道让内地居民轻视和鄙视香港,不利于与香港居民建立积极的联系;对香港居民来说,内地的报道有偏向地强调少数人的行为和香港暂时的问题、“唱衰”香港,视野和气度狭小,与中央对香港表达的一贯支持也不一致。民间联系的相向发展,才有利于内地和香港的社会融合。

参考文献:

- [1] Brewer, Marilyn B. 1991. "The Social Self: On Being the Same and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7:475-482.
- [2]—. 1999. "Multiple Identities and Identity Transition: Implications for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3:187-197.
- [3] Kim, Jungsik and Sik Hung Ng. 2008. "Perceptions of Social Changes and Social Identity: Study Focusing on Hong Kong Society after Reunificatio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1:232-240.
- [4] 吴晓刚, 2014, 《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 设计理念与初步发现》, 《港澳研究》2014年第4期。
- [5] 叶华, 2015, 《出生地、教育获得地与香港居民的职业收入》, 陈广汉、黎熙元主编, 《当代港澳研究(2014年第4辑)》第116-132页,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Understand to the Identity of Hong Konger

YE Hua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Employing data from the second wave of 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 this study finds that Hong Kong residents from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have different identity inclinations. While Hong Kong residents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similar level of “Hong Konger” Identity, they identify with different level of “Chinese” Identity. Comparing to residents born in Hong Kong, those who were born in China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higher level of “Chinese” Identity. However, those who are at age from 15 to 24, and those who have non-degree tertiary education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lower level of “Chinese” Identity, which are consistent with their economic opportunities in the Hong Kong labor market.

Key words: Chinese; Hong Konger; Double Identities

收稿日期: 2016-07-13

基金项目: 本研究成果获得中山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以及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资助。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 HKPSSD）项目，由香港研究资助局—中央政策组公共政策战略研究计划资助（项目编号 HKUST6001-SPPR-08，主持人为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吴晓刚教授）。

作者简介: 叶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骨干研究人员。